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乔力 主编

现代中短篇小说选

杨政 选析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北京京联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现代中短篇小说选

杨 政 选析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现代中短篇小说选 / 杨政选析.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 乔力主编)

I. 现... II. 杨...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1419 号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现代中短篇小说选

杨 政 选析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发行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园 17 楼 (010)87873533 邮编 100068)

新华书店经销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19.625 印张 461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 - 80680 - 188 - X / I · 107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065007)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

顾问	王运熙	邓绍基	吴宏一	陈华昌	杨雨前
	张炯	傅璇琮			
主编	乔力				
副主编	邵东	胡大雷	黄道京	葛承雍	

编纂委员会

丁少伦	马自力	马奕	门岗	方智范
王定璋	王英志	甘英	刘文忠	刘庆云
刘怀荣	刘扬忠	刘明浩	刘峰焘	许总
乔力	池倩	朱晓晨	杜贵晨	李方
李少群	吴兆路	吴章贵	张玉璞	张亚新
张光芒	陈庆元	陈如江	陈洪宜	杨明
杨政	欧明俊	武卫华	施议对	周满江
周锡山	赵永纪	赵敏俐	胡大雷	荣斌
洪本健	高巍	聂言之	崔海正	桑林佳
徐其超	曹顺庆	章亚昕	黄道京	黄霖
寇养厚	韩毓	郭丹	葛承雍	程郁缀
管士光				

总 序

乔 力

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会天然地形成一种非常优势,使得中国文学有可能在足够漫长的时间里创造出辉煌业绩,给人类文明留下极为丰厚的精神遗存,供我们民族永远怀想受用。不过,像许多事物都拥载着多元复杂属性一样,如果从对面角度来看的话,则又同时变作某种很沉重的承传负担。因为一旦面对这些山聚海积般浩繁汗漫的书册卷章,便立即涌生出接受的困难困惑:你到底应该读些什么?究竟怎样读?而实际上又能够读得了多少?——局限于主客观种种条件的制约,社会或个人都难以做到无论巨细差等,皆通体包纳,所以,就必然性地出现了如何选择乃至精选的问题,并进而牵涉到一系列的判断观念和运作标准。

新世纪伊始,直面自然人文等各学科门类的分工日趋专精细密、生活工作节奏紧张快捷、实用功利目强化而竞争异常激烈严峻的局面,现代中国早已疏离了古代农业社会那种伴青灯明月、细细把玩体味以穷年皓首的闲散心境与惟求任心适意、不需再计虑效果收益的淡泊无为态度。那么,已然产生凝定而属于历史的文学作品,怎样才能跟随不断发展前进的时代步伐,仍成为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融入未来,并由民族走向世界,张扬它永恒的美?换言之,永远是人们感性的愉悦飞扬和理性上育导教化的绝不能被替代的必需。

缘于上述,我们方始编纂这套大型书库,指出了贯通古今、以时代纲领文体的结构框架和精选的、具载恒久垂范意义的“经典”式作品总汇——即通过纵向的历时性观览,从整体上展现自远古

洪荒的先民制作开端直至最较晚近的 1949 年以前的所有中国文学产生、发展、丰富、极盛而蜕变新生的流变轨迹与大略面貌。使人们在直觉审美感受的过程间,获取系统全面的中国文学知识,熟谙洞悉它的每个结构成分。另一方面,也借助横向共时性的断面取舍,使得相应的具体作品充分传现那些关于文学本体以及某一特定文体样式的美学特性和艺术精神;并因其创作巅峰的最绚丽景观所辉耀的最大可能性范型价值,或由一定的阶段空间所显示出的一定更代嬗变类型。要言之,它们既包容有当时的复杂社会现实的典型意蕴,同时又未曾丧失、消解掉充沛张扬的现代生命活力,乃是屡经时间长河的荡涤淘洗,以代积层累方式架构起巍峨的中国文学经典大厦。它千门万户、千姿百态,永远流闪着辉煌璀灿之光。

下面再就《中国文学经典书库》的诸有关事宜略为阐明:

——首先是读者定向。我们关注的是具备中等文化程度,乃至大学生、研究生、工作着的白领蓝领们与所有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最广泛的读书界朋友。衷心希望《中国文学经典书库》能成为你们的“精神家园”,为你们不断追求探索的焦灼心灵伸展开一片清新温馨的绿荫,吹进青春热情的气息。

——其次是编纂的框架构想和意图。这里自然是以文学作品为主体部分。具体而言,每种精选本前皆首先设置“导论”,概述本文体于此书所界定之历史时段内的演进行程和重要业绩,并在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上,论析其表现特征、思想内涵及主流艺术精神;进一步阐述因整个文学现状与此特定文学样式自身运动规律所生成出现的创作流派、风格面貌。而以后的篇幅,则以选录的作家作品为单元。“作家简介”除却例行的生平行迹说明外,特别注重其文学活动及与文体相关的创作情形,目的在于强化“评论”色彩,由之使这种个案的微观烛照同“导论”的具体文体现象的中肯评析,以及《中国文学经典书库》收入的《中国文学

史》中的“总论”《中国文学流变概说》所作的宏观把握,形成点、线、面纵横交织、互相呼应的框架结构模式。至于选录作品,首先认定的是审美价值——一种纯文学本体的意义,然后就艺术创造性来统领其他社会教化等内涵,求得两者的有机融合。其后的“品鉴”,则无论总瞰俯览、远察旁涉为印证而生发妙境,还是探幽抉微、精擘细辨以臻达澄彻洞明之胜地,抑或径从个别主旨、意趣、背景来进行阐释考订,均系视各自实情的需要落笔,并不强求规范一致。相反,我们倒是力求多角度、广视点的繁色纷采,精当出新。

《中国文学经典书库》除却主体的作品部分,还另有五种既断代又互为联续衔接的《中国文学史》,虽然各自具载相对独立性,但整合总观之,则成为从先秦直及现代的通史。考虑到前面主体部分既有的“导论”、“品鉴”及此书中的《中国文学流变概说》,已经构成的交错呼应的网式框架所涉及过的内容,为了避免重复,同时也便于改变、拓展视野,故这部文学通史则侧重于对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上整体文学面貌的宏观把握,注重描述其行进过程中产生的艺术流派及创作风格、文学思潮、重大现象等,尽可能地弱化一般作家作品的具体剖析。当然,在总则方面遵循这种撰写精神的基础上,各断代文学史也有各自的特点,方式方法并不求整齐划一。

——另外,作为一部集体协力撰写完成的大型丛书,我们一直强调贯穿通体的连续谐调指向,故而与另一类的个体研究著作同样承载着严肃的责任感。应邀参加的多为学术造诣深厚精湛的著名古典文学专家,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山东、广西、辽宁、山西、江苏、福建、湖南、四川、贵州等各地声誉卓著的高等学府和专业研究机构,其中有些熟识并在我主编的另一些丛书、书系里多次合作过,有的却是首次共事。但无论怎样,我们大家都抱有事业与友情并进的相同宗旨,愿意在有限的生命途程中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留下一段美好愉快的记忆,以慰藉那本原性的苍凉。

上个世纪初,值当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五四”的一批知识精英以大智慧、大学识、大勇气,奋然打破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僵化、因循守旧陋习,引进西方近现代文明,倡扬“民主”“科学”精神,吹进来健康新鲜空气,以永远的青春和激情开启一代新风,让人们看到希望和未来——每想到这些,我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如今又值新世纪伊始,考量已往,眺望前途,将会作出什么样的思考呢?我想,是该出现文学文化大师、学术巨人的时候了。但现今触目所见,太多了些掂斤称两的匠人雕琢的小家子气。就一定意义而言,大师巨人的产生需要最广泛普遍的、适宜的文化基础与时代土壤,但适宜的基础、土壤则需要长时期的积累培植。那么,就让我们脚踏实地,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明素养、文化学术素质起始,作一些消除浮躁之气、纯净人们心灵、积累培植基础的工作吧!记得上世纪40年代初,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名人传·贝多芬传》的“译者序”说:“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该有更深刻的意。”我想,这是“五四”精神的延续和一种新的演绎。由是言之,除却工艺技能与客观科学知识的训练、学习外,文化文学素养的充益提高,对于“心灵”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同着新世纪的朝阳前行,是应该也完全可以有所作为,这既是幸运,也更是历史的使命——《中国文学经典书库》便是最新一份工作成果,愿新世纪的人们喜欢它。

无庸烦言,限于学识和精力,诸多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教正,这是对我们的关心与鼓励,铭感之情将永远在我们心中。

2004年春于北京旅舍

导 论

中国现代小说是随着中国新文化思潮的兴起而产生的。1918年5月,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标志着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开始。其“现代性”的标志,一是用现代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一是用现代文化精神、艺术观念和艺术表现技巧建构小说的主体骨架。由于鲁迅的开创和示范,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小说逐渐繁荣并发展起来,开始了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

中国现代小说的出现、繁荣和发展,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直接成果。“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文化启蒙运动,是一次对外开放的、主动引进的文化和思想思潮。正是在这个运动中,中国人向东、西方打开了自己的大门,将形形色色的主义、思潮接引进来。这种无拘无束的对外开放格局,极大的开阔了中国文化精英们的视野,启发了他们的心智,激发了他们的创造性和主动进取精神。那是一个藐视权威也的确没有权威的时代。人们可以自由地聚会、结社、创办刊物,自由地评价、引进、阐发国外各种理论、观念和方法,发表个人的真知灼见。其动机在于用先进的思想利器对中国民众进行启蒙。许多具有高度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怀着救国救民的主观愿望探求真理,启发国人。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经历了曲折和磨难之后,几乎不约而同的像

鲁迅那样,认为要改变中国的形象,第一要著是改变国民的精神。而改变精神的最有力的武器,当首推文艺。当时的文化精英们纷纷从事文艺创作,试图通过文学作品来进行思想启蒙和社会改良。从这一点上说,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其初期阶段,实际上很难与新文学运动截然分开。就像欧洲启蒙主义运动一样,许多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在中国,以文学参与社会和时政则更是不足为奇的。“五四”时代如雨后天春笋般出现的文学团体和创作流派,鲜有真正游离于启蒙运动之外者。不但聚在《新青年》周围的作家群体和1919年成立的“新潮社”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即使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浅草社、现代评论派等被称为“纯文学团体”的社团流派,其实又何尝没有各自的思想倾向和政治观点。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大环境下,作家社团几乎不可能保持“纯”文学团体状态。随着中国新文化阵营的分裂,中国社会政治派别分野的明显,各文学团体的内部和外部也发生着分化,鲁迅所说“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消沉的现象也出现了。积极的“参与意识”下作家们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对时代精神的积极应和,一直表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

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五四”作家们在各自的思想视野和艺术视野内,遵从着启蒙思潮无形的“将令”。鲁迅以其忧愤深广、发人深省的小说抨击封建主义文化,揭露封建道德伦理的“吃人”本质;郭沫若不惜用标语口号式直白的诗句,进行着“狂飚突进”式的反封建呐喊;郁达夫则以切身的人生历验和情感体验,抒发着故国陆沉的哀痛,企盼着祖国的尊严和富强。以《新潮》杂志为阵地的作家群和众多的文学研究会作家,则以“为人生”的“问题小说”表达着对民族、国家、社会和现实人生的关爱。由于众多作家的参与,“问题小说”在新文学运初期几年中,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其“问题”涉及了国家、社会、时局、婚姻、恋爱、家庭、教育等诸多方面,锋芒所向,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制度、思想道德伦理造成

的严酷现实和深刻影响,试图通过所提出的问题和所开出的“药方”,进行反封建、反传统、民族自强和人的解放的文化和思想启蒙。作家们借小说“各述己见”,其“问题”和“药方”真是五花八门。罗家伦发于1919年2月《新潮》上的《是爱情还是痛苦》,是最早的“问题小说”之一。作品针对“五四”青年普遍关心的婚姻、爱情问题而倾诉和发问,杨振声的《渔家》和叶绍钧的《一生》、《欢迎》等,则表达了对下层劳人民的生存问题的关注,叶绍钧的一些小说还提出了妇女儿童受教育的权利问题;王统照的初期小说关注着“爱”与“美”,希望“爱”与“美”能化解现实人生的“丑”与“恶”。庐隐的小说由初期对男女婚姻恋爱自由与否的关注,转向对“人生究竟”的探问;许地山则将人生平安宁静的“药方”,寄托于向宗教的皈依。“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问题小说”作家当首推冰心。她的小说涉及家庭、社会、婚姻、爱情、儿童妇女教育、知识分子人生理想等诸多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如《斯人独憔悴》反映了爱国青年与封建家长之间的冲突,揭示了封建家庭和专制是扼杀人的爱国热情的罪魁;《去国》写怀有“实业救国”理想和技能的归国学子,怎样在军阀政权的压制下无法施展本领,不得不愤然离国去发展自己,反映了人才使用与社会现实的矛盾。《最后的安息》描写了童养媳的悲苦命运,为童养媳们的人身解放呼吁,《庄鸿的姊妹》则针对着妇女受教育的权力提问。冰心小说涉及了诸多问题,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有时也能开出她认为行之有效的“药方”,但她更热衷的“药方”,则是所谓“爱的哲学”。她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仇恨,人自身遇到的诸多痛苦,都可以用“母爱”和“博爱”精神去化解。《超人》、《烦闷》、《悟》、《最后的使者》、《爱的实现》等均是对这种“爱的哲学”的探问和阐发。“五四”时期致力于“问题小说”创作的作家,不管他们探询的“问题”和开出的“药方”怎样的千差万别,但在“启蒙”旗帜下积极参与的精神却是相通的。

随着中国社会时局的变化,现代小说的“参与意识”也带了上

鲜明的阶级色彩。“革命文学”的倡寻和稍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展,使许多作家或主动地集合于“革命文学”的旗帜下,或以部分创作实绩应和了这个运动。蒋光慈、胡也频、叶紫、柔石、茅盾、丁玲、沙汀、艾芜、张天翼等“左”派作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积极倡导、响应和实践者。他们的作品或像蒋光慈那样直接反映暴动、革命、地下斗争,或像丁玲、胡也频的某些小说那样反映“山雨欲来风满楼”般的革命斗争形势。而叶绍钧、王统照、吴组缃、巴金等作家,虽未在组织上集合于“革命文学”的旗帜下,却也以其作品呼应着“革命”斗争。王统照的长篇《山雨》,叶绍钧的短篇《多收了三五斗》和长篇《倪焕之》,吴组缃的《樊家铺》以及巴金的长篇《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和许多短篇小说,从各自的角度和视野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现实。在这些作家中,当时还是“安那其主义”者的巴金对“革命”斗争的理解和描写,又分外显得激烈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积极倡导、实践和呼应者队伍中,虽然大家“参与”的主观动机是相同的,但是由于各人的艺术修养和生活积累的差异,创作上存在着明显的艺术水准的差异。比如曾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流行的“革命加恋爱”小说,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颇多,显示了艺术积累的粗浅和创作的匆忙。而创作了《蚀》三部曲、《虹》、《子夜》的茅盾,却显示了大手笔的艺术功力。

积极的“参与意识”在民族的生死存亡面前表现为高昂的爱国激情和民族自尊心,当东北三省沦陷,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关头,对于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促使作家们转向“救亡”主题的发掘。东北作家萧军、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人率先以自己的小说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讴歌东北人民的觉醒和反抗。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派别的作家,集合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或参与实际的社会工作,或创办、编辑报刊进行抗日宣传,有的甚至有组织地深入抗日战争前线体验生活,进行宣

传活动或直接参战(如“作家战地服务团”、“抗敌宣传队”、“抗敌演出队”等)。当然,他们也没有忘记作家的主要职责,以作品去反映和描写这场伟大的抗战。邱东平、姚雪垠、刘白羽、杨朔、艾芜等人,以较多的精力致于抗战题材小说的创作。《帕米尔高原的流脉》、《红石山》(杨朔)、《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姚雪垠)、《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茅山下》(邱东平)、《刘粹刚之死》(萧乾)、《秋收》、《纺车复活的时候》、《春天的田野》(艾芜)《五台山下》、《龙烟村纪事》、《幸福》(刘白羽)等,是及时反映抗日战争的较好作品。茅盾的《腐蚀》、老舍的《四世同堂》、端木蕻良的《螺蛳谷》、孙犁的短篇集《荷花淀》、《芦花荡》、《嘱咐》、《采蒲台》以及沙汀、张天翼等反映国统区抗战生活的小说,则可以说是当时抗战题材小说中的佼佼者。

至于延安革命根据地的作家,本来就有强烈的参与意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向作家们提出了明确的“参与”和“改造”要求。怀着自觉的“参与”热情和虔诚的“改造”愿望,根据地作家尽可能地深入斗争第一线,反映抗日游击斗争、反奸除霸斗争、减租减息斗争和土改斗争……,将艺术创作与“为工农兵服务”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其中虽难免显得粗浅和直露,但也不乏孙犁、柳青、赵树理这样有一定艺术成就的作家和较有影响的作品。

综观“五四”以来的现代小说,虽然在题材领域、美学风范和艺术追求上堪称百花争艳,异彩纷呈,但由于“五四”启蒙精神和后来具体国情的要求,以及几千年来重功利教化的文学传统的影响,占据着中国现代小说主流和正宗的,仍然是“参与意识”强烈的一部分。在一般文学史家的心目中,亦是如此。

二

虽然“参与意识”强烈的那部分小说被看成中国现代小说的主

流,但却并不是唯一的潮流。正是诸多的艺术流派和多样化的艺术追求,共同构成中国现代小说的巨流,推动着现代小说的发展。文学关注时局,关注社会政治,及时地反映切近的现实生活和时代氛围下人们共同关心的某些问题,这当然是文学的一个重要职责,却不是唯一的职责。文学还应该关注人的生存、发展,关注人的情感和更加复杂的精神世界,反映人的灵与肉的需求。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不能只用切近的、社会功利的尺度。那些及时地、直接地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固然给人以鼓舞,那些反映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和喜怒哀乐,反映形形色色的生存形态和人的心灵世界的作品则给人以多种的审美享受和精神启迪。茅盾的《子夜》使人认识了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深刻矛盾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情景,老舍的《骆驼祥子》和《月牙儿》则使人们领略了旧时代市民生存的艰难和精神的痛苦,沈从文和废名的田园小说则使人们领略了生活的诗意和田园之美。在艺术创作中,作家们应该有选择题材、主题、艺术样式和美学风范的多种可能性,而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史实亦是如此。当冰心等人探讨着人们普遍关心的诸多“问题”时,鸳鸯蝴蝶派作家们却在忙于撰写颇受市民读者欢迎的哀情、艳情、黑幕和侦探故事;当“普罗文学”作家们大写“革命加恋爱”小说时,田园派和乡土派作家却在抒写着情感记忆中的乡土生活和田园诗意;当三十年代的巴金、老舍、茅盾、叶绍钧、王统照等人构思着各自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时,中国的“新感觉派”作家却在运用从日本新感觉主义那里移植来的弗洛伊德理论,表现着光怪陆离的都市风景和人的病态的精神世界。在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的“时代主旋律”高扬的四十年代,其实也是小说的题材和主题,多样化追求异彩纷呈的时代。在民族解放的群体合唱中,也有纯属个人性的内心独白,在英雄颂歌的主调下,也还回响着小人物庸常人生的琐屑愿望的娓娓诉说。路翎《饥饿的郭素娥》探究和披露了人的心灵深处的秘密;废名《莫须有先生》系列表达着普通人面

对颠沛流离生活的细微感受,靳以的“平民小说”描写了普通人和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和情绪感受,苏青的小说(《生儿育女》、《结婚十年》等)则纯粹是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感受的诉说。徐订探讨着人的生命意义和终极存在等深奥哲理,钱钟书则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表现人生的孤独、偶然和无奈的“围城”主题。他们的作品充溢着浓重的现代哲学意味。

即使是同一位作家,也可以有题材、主题和艺术格调的多样性选择。萧红的《生死场》等小说是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呻吟、挣扎、反抗的东北沦陷区人民生活的真实再现,而《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却是对童年记忆中温馨生活和美好人事的诗意观照。端木蕻良通过他的《科尔沁草原》等作品,表现“大地”的粗犷和野性的时候,更钟情于表现个人对于自然生命的诗意感受,以及处于众多女性包围中的童年生活的柔漫和温馨。茅盾既写出过关注“大时代”的诸多作品,也写过诸如《诗与散文》、《创造》等表现小资产阶级生活及情调、情绪的小说,《创造》一篇甚至较早触及了“围城”现象。当男主人公君实“创造”了现代女性嫋嫋的时候,也便是他陷入他“创造”成功的痛苦的时候。同一位作家尚且可以具备多副笔墨,更何况不同艺术修养、趣味和不同经历、积累的众多作家!题材、主题的多样性,是艺术创作的自身规律要求的。尽管中国作家们曾受到了传统文学观念和传统文化心态怎样深刻的影响,也回避不了生活本身的多样性和人的艺术修养和艺术情趣的复杂性。一个时代的文学应该有它的“主旋律”,但单一的题材和统一的主题却并不符合文学的正常规律。

从文学功能的角度分析,小说题材和主题的多样化也是必要的,文学所应具备的功能是多层次的,不但可以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等社会功能,而且还可以有审美功能、消遣愉悦功能等等。一部文学作品可以有多重功能,也可以只具备一种或几种功能。反映了时代精神和广大民众的共同呼声、具有深刻社会内涵,因而有

较大认识和教育意义的作品，固然是人们需要的好作品，即使是借人物或故事宣示某种主张、意图的宣传鼓动作品，在特定的环境、气氛下，也是有其意义的。而作品的认识、教育意义，也不单单是只有反映社会生活、现实斗争、群体意志的作品才能充当其任；那些描写一般的生存情状、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反映人的欲求，刻画精神、情感世界的作品，同样也有认识、启迪的意义。甚至可以这样说，这类作品在使读者更广泛、深刻地了解社会、认识人生、人性方面，也许比那些急功近利的作品更有价值。况且，文学作品的认识、教育、启迪意义，应该是寄寓在生动的艺术形象中的，作者的主观意图越隐蔽越好。人们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在艺术的想像和审美的愉悦中，领悟或认识某种意义或哲理。公式化、概念化、直露肤浅的宣传品，是会令人无法卒读的。

我们也不应该全然否定那些“消闲”、“娱乐”文学存在的价值。在文学与读者的双向选择中，不但文学要选择和影响不同层次的读者，不同层次的读者也同样在选择和影响文学。瞿秋白在论及新文学与大众的关系时，曾指出过新文学与文化层次较低的人民大众和一般市民读者之间存在的语言形式、艺术趣味的隔膜，欧化的语言和非大众化的艺术趣味使现代小说一度失去广大的市民和工农大众读者。颇遭新文学家非议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之所以长期地颇有市场，正是因为他们的形式和趣味迎合了广大市民读者的欣赏口味。而在我国的读者层中，市民阶层是一群为数甚众的读者层，他们大都要求在紧张的生存奔波劳碌之余，能从文学作品中享受一份阅读的轻松愉快，“鸳蝴派”作品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当我们重新回顾文学史的时候，有必要为“鸳蝴派”小说讨一点“公道”。这是一个复杂的艺术流派，其艺术主张、艺术追求和品位都极为复杂。其中当然有大量庸俗、色情、趣味低下之作，但也不乏有一定艺术价值和思想性、社会意义的较好作品。而且这派中的许多作家，也曾通过刊物、杂志发表宣言，强调作品的教

育、感化作用。诸如：“借游戏之词，滑稽之说，以针砭乎世俗，规箴乎奸邪也。”^①“虽曰游戏文章，荒唐演述，然谏讽微讽，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亦未始无感化之功也。”^②等等，即可见出其创作动机的严肃性。

然而，囿于多年固有观念的束缚，在题材和主题以及艺术追求的多样化这一客观现实和文学史的评价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某种偏颇。翻开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些曾经在当时较有影响、或较有探索精神的作家及其作品，长时间地被冷落、被忘却，不能进入某些人们的观照视野，更不能在文学史中找到一席之地。例如“新感觉派”作家在文学史中只是被一笔带过或简略述及，像徐讦、无名氏、张爱玲、苏青等当年曾经很轰动的作家，则被排除在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外，甚至像沈从文这样品位较高的作家，亦在一段时期内被冷落，而一些与正统权力话语观念相“左”的作家，其命运更遭。他们或根本不被提及，或作为“批判对象”被列入。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曾经遮蔽了文学史的本来面目，以至于今天的文学史家和研究者，为恢复中国现代小说的本来面目，还需做大量查漏补遗或重新评价的工作。

三

“五四”以来的中国小说之所以被称为“现代小说”，一方面是因为在思想观念、精神指向上具备了“现代性”，诸如“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的自由、民主、科学和人的解放旗帜在小说中的应和，作家们对人的内部世界的探究和揭示，具有现代哲学意味的哲理探讨，等等，可以说突破了传统小说所承载的观念、意识而呈现出

① 《游戏杂志·序》。

② 《〈眉语〉宣言》，《眉语》第1卷1号。